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杨少波

历经1200余年发展的书院,是我国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历代兴建的书院数量不少,然薪火不绝者不多。那些幸存下来的书院,融合儒家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已是少之又少,还能兼具中国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于一体的更是凤毛麟角,湖南通道恭城书院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个金秋暖暖的午后,我慕名走进她。

1 托举文明之火

沿着布满青苔的石阶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飞檐翘首的门楼,雄伟壮观,古朴典雅。

恭城书院坐东朝西,由门楼、两栋斋舍、讲堂四部分构成,建筑物沿纵轴方向依次排列在一条轴线上,由正中一条通廊串联成一个整体,四周砌青砖作护墙。各栋建筑空间有天井,内植花草树木。门楼斋舍和讲堂分上下两层。通廊系两层,架设木楼梯。门楼为重檐歇山顶式,正楼开敞窗户,可眺望山城风光。

两栋斋舍为坡顶,上下各置外廊。讲堂上下两层,底层为一面全开敞式堂屋,供讲课用,上层供藏书等,整个建筑全系统木构件,穿斗式构架。挑檐、门窗装修简朴,造型独特,宏伟壮观。四栋两层木楼,由门楼、教室、礼堂、通廊四个部分构成一座完整有序的建筑群。古色古香的恭城书院,有机融入了汉族与侗族精湛的建筑技艺,可谓“浑然天成,无有畔岸”。

侗族是百越民族的一支,跨越民族的一部分。主要居住在湖南、贵州、广西交界地与湖北恩施一带。通道侗族自治县是湖南省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其中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8.3%。恭城书院所处通道老县城溪溪镇古称“罗蒙砦”,“罗”即“骆”的异写,“蒙”是“氓”的异写,“罗蒙砦”含义是“骆人寨”,“就是今日侗族祖先居住的地方”(邓敏文《中国侗族村寨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即为“荆州西南隅要服之地”。

通道侗族自治县军事战略位置重要。秦始皇派五路大军南征百越,三国时诸葛亮南征进入岭南,唐初李孝恭、李靖率领大军十二路南征百越,均以通道为孔道。

清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石达开率40万太平军从广西取道通,趋靖州,下沅州,在通道恭城书院挥笔写下“树三十面红旗,召来豪杰英雄,虎豹威,熊罴猛,吊民伐罪,只鼓一气渡黄河,战必胜,攻必取,才收我华夏之社稷;享二百年园祚,裹去贪官污吏,豺狼心,狐狸心,暴敛横征,戮尽万民赤子,得不,失不难,何保尔夷狄之江山”对联一副。

宋朝官吏王祖道打通了湘至黔、桂两千里要道,收九百零柒峒,得六万四壮丁,让“自汉唐以来的不臣之地,皆入版图”,而由罗蒙县改名通道侗族自治县。为统治教化这些曾是南蛮的“不臣之民”,保证多民族之地、西南要隘久安,宋朝庭和通道地方共同建起了罗蒙书院。

书院刚建成,便迎来了周敦颐的弟子、宋代理学创始人程颢到此讲学。他所讲的“格物致知”和哲学儒学,并兼容释、道与诸子百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一时,周边的学子云合影从。恭城书院托举着文明之火,声名远播湘、桂、黔三省内外,赓续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明清时期,恭城书院培养出了十几位进士,三十多位举人。

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成就了恭城书院。在恭城书院文脉流芳、熏染教化下,当地的侗民族文化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色。侗民族敬畏自然,热爱生命,崇尚“天人合一”,与儒家精神不谋而合。“生产半忙半闲,生活半丰半简,喝酒半醉半醒,心态半佛半仙”,侗族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侗民族热情好客,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常在一起“行歌坐夜”“多嘎多耶”。

恭城书院,也是身处僻远之地的通道了解世界、参与时代的窗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道一位名叫翁信孚的县长在书院前厅立柱上也刻下一副对联,上联是“小学毕业的一定要升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上大学”,下联为“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设法升学”。并非这位县长没文化,连一副对联也写不工整,而是他号召民众读书上进的拳拳赤心,故用新白话冲击旧思想。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里开蒙进学的梁国焯、刘本源等一批爱国青年走上了民族抗日的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和缅甸远征军。新中国成立后,潘仕海、杨立登、张齐能、吴思潮等一批热血青年又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不少学子把鲜血洒在了异国他乡。



通道转兵纪念馆。

作者供图

恭城书院：千年文运铸丰碑

简介

恭城书院原名罗蒙书院,位于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罗蒙山下,始建于宋1105年,后几经损毁搬迁。目前所见的书院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侗家的能工巧匠将罗蒙书院在原址重建,更名为恭城书院。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书院。在这里召开的通道会议直接影响了红军的长征走向,也使红军转危为安,为红军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恭城书院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委宣传部公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定格“通道转兵”的历史

“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进入恭城书院的道路旁,巨幅宣传牌上的文字醒目。这是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所说。而“重大历史事件”之“通道转兵”,就是在恭城书院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所决定的。

湘江战役结束,红军主力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悲壮诗篇。但这支英勇的大军也从西征时8万之众,只剩下3万余人。“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极言其惨状。

在翻越湘桂边境老山界的路上,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在担架上边走边谈。而正在此时,蒋介石颁布了《湘水以西区剿匪计划大纲》,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配置在通道北上的靖州、会同、芷江、绥宁、城步、武冈一带,布置形成了一个大大口袋,并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修建了210座碉堡,张网以待。一方面又派重兵围追疲惫的中央红军。湘江血战的悲剧又将摆在红军的面前。

12月10日,红一方面军二师攻占通道侗族自治县城。

12月12日,中央红军在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行军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面对蒋介石精心设计的“湘西大口袋”,李德、博古仍坚持按报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路线北上。

“现在我们的西部是贵州,那里的土军阀王家烈很不得民心,而且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很厉害,又都是些抽鸦片烟的双枪兵。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完全可以避实就虚,甩开蒋介石的重兵,到贵州去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毛泽东的浓浓湘音在恭城书院久久回荡……

经过激烈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原定向西前进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13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这一段意义重大,挽救红军命运的辉煌历史在恭城书院定格;一曲力挽狂澜的英雄之歌在侗乡大地奏响。

通道转兵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北上湘西遭致全军覆没的危险。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解除军事指挥的毛泽东,在这里重新走向革命的前台,“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的领导”。

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似乎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青年时期在湘江河畔的岳麓书院勤学苦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惑之年任通道侗乡的恭城书院,在革命的风雨飘摇中,扶大厦之将倾,找到了革命转换的“通道”。

红军长征从此处处有“通道”,不仅是地理的通道,也成了历史的通道,胜利的通道。通道转兵还为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成立13年的中国共产党如一个“穷人家懂事的孩子”开始走自己的路,不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从此独立自主地“担当起中华民族解放的大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从此初步形成。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向,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会议原貌。

作者供图

3 再谱时代华章

如今的恭城书院不到百米之遥处,是通道转兵纪念馆。这是以恭城书院为核心基础,于2014年底建成的纪念馆。它包括主题陈列馆、会议旧址、纪念广场、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东岳宫、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住所喜庆会馆、红军街等部分。

在纪念广场,但见彩旗飘扬,游人如织。来自广东深圳的参观团队向毛泽东等伟人雕像敬献花篮,而通道二中的二百余名新生正举行庄严的缅怀仪式,表达着对领袖对伟人对革命先烈的爱戴、崇敬之情,也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多年来,通道转兵纪念馆努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特别注重发挥恭城书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近几年,他们在维护好小水战斗旧址、犁子界红色遗址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创建了杜鹃草堂长征文化园、兵书阁红色文化体验馆、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官团老寨宿营地等新的红色旧址和人文景观。

我看到,在杜鹃草堂,可以沉浸式体验“欢迎红军进侗乡”、实景模拟“红军飞夺泸定桥”“五姑娘春米送红军”等场景故事,感受峥嵘岁月的艰辛,由此体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现在,恭城书院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道转兵纪念馆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沙开通了到通道的红色旅游专列,近十年来,来恭城书院和通道转兵纪念馆参观学习的游客达1000万人次。

夕阳西下,我走出通道转兵纪念馆,站在高高的石阶上伫立眺望:远方群山如黛,苍山如海。见证着岁月沧桑和历史荣光的县溪红色小镇正沐浴在金色秋阳的余晖中,清澈的渠水河蜿蜒向北流去,一幅宁静吉祥的景象。

新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我相信,厚积文蕴的恭城书院,必将在新的伟大时代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湘江观潮

诤议城市歌曲

未已

城市歌曲,顾名思义是以刻画城市外观、城市居民、城市内在精神等多角度城市形象为主的一类歌曲,是促进听众对城市产生想象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好的城市歌曲通过对意象表达的梳理和阐释,能够有效连接听众与城市两个主体,唤醒听众的个人城市经历,形成集体共性的城市归属感、推动群众交往中对城市的正向体验,并从内部逻辑与外部解构更好认知一座城市。

具体举例来说,一方面,就主题创作而言,围绕强政治性、显地方性、高象征性、泛世俗性等特征,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歌曲是由林夕作词、小柯作曲、百位明星共同演唱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北京欢迎你》,北京城市的地方意象在歌曲的演唱视角、歌词内容、曲调旋律、情感表达、创作话语权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并通过奥运会这一契机强有力地走向世界传播。

另一方面,就地域创作而言,从《浏阳河》《鼓浪屿之波》《请到天涯海角来》等经典,到近年来一批带有鲜明城市印记的歌曲开始流行,如歌曲《北京北京》《成都》的走红,再如去年火爆全国的《早安隆回》,一首歌曲成为经典或成功跨界出圈,往往能使数以亿计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受众对一个城市心向往之。

在全国各地城市品牌推广方式日趋内卷的当下,相较于投资大、人员多、运作周期长的影视、演艺项目,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传播范围广且可持续的城市主题歌曲俨然成为诸多市县的不二选择。随着它们的唱响,歌曲这一形式为一座城市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被人们极大关注,并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和旅游景区所青睐,俨然成为各地“标配”之势。

近期,湖南的城市歌曲创作来势喜人,歌手李玉刚的现象级爆款“家国三部曲”之《心忧天下》,让亿万网友关注并了解左宗棠和湖南湘阴。歌曲《走,去永州》全网播放量逾50亿次,二次创作系列作品5万余个;歌曲《岳阳印记》融合巴陵特色,上线不到一周点击量达400万;湘西大山走来的“00后”陈珂所作歌曲《幸福鼓》以苗族鼓舞为基础融入流行音乐,获第四届少数民族歌曲创作征集大赛一等奖。这些歌曲以人民的视角和在地的心态,深度切入城市的文化肌理,在歌曲语言上展现方言魅力,在歌词文本上展现城市景观、民俗饮食等带有城市主题的元素,以饱含情感的方式间接地传达着城市文化、塑造着城市形象。

毋庸讳言,城市歌曲创作传播中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也要直面改进。首先,歌曲质量上要精益求精。以《早安隆回》为例,歌词仅一句“早安我的隆回”蜻蜓点水般点了一下地名之外,再无半句对“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等当地历史、人文的描述和介绍,把隆回换成任一城市也能唱,加之这首歌曲的思想性、艺术性从专业角度来说不过平平,若非借助卡塔尔世界杯热度,大抵也会被淹没。反之,《浏阳河》《茉莉花》则以其上乘的品质经久不衰,成为最美城市音乐名片。

这需要我们歌曲创作者戒骄戒躁,不为写歌而写歌,而是静下心来挖掘一地的底蕴内涵,从而写出接地气、暖人心的城市歌曲。

其次,歌曲内容上要突破藩篱。城市歌曲创作有一个最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如何平衡特殊性与一般性,换言之就是在立足地域特色的同时,放眼全国、面向世界的问题。以近期我省创作的作品《走,去永州》《岳阳印记》为例,两首作品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前者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后者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然而地方特色有余却全局视野欠缺,比如方言演唱在前期很容易吸引当地籍的听众,但往往难以更进一步引起非特定人群的关注。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地域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站在这一视角上,我们城市歌曲的创作不能限于一隅,要在依托湖湘文化的基础上,找到与时代和人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合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歌曲也才能传得久、传得广。

再者,歌曲传播上要不遗余力。在市场化时代,好酒还需勤吆喝已经不是什么独家秘诀,真正值得我们思考探索的是如何来吆喝。应该说,能够吆喝的前提是歌曲过硬的质量,但也要注意宣推的方式方法。今年“百团百角唱新歌”湖南省文艺院团巡演活动中由省花鼓戏剧院出品的花鼓戏歌《长沙味道》和省湘剧院创作的湘剧戏歌《十记·湘见欢》两首分别体现长沙市井和湖湘文化的歌曲令人眼前一亮,但遗憾的是叫好不叫座,活动结束后并未见其产生更大影响。与之相较《走,去永州》的宣发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做到了立体矩阵和全时推进。

有鉴于此,我们城市歌曲的宣传推广,务必做到天时地利人和,即抓重要时间节点,如省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借传播平台大势,依托湖南广电、湖南出版、湖南演艺等金字招牌,以各种形式让歌曲出圈;同时,扎根群众,研究听众心理,为未来以城市歌曲为媒介手段增强城市对受众的向心力提供路径选择。